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丛 书
王 韬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不作人间第二流，奔腾万里驾轻舟。
苍茫谁尽东西界，门户终分上下游。
千古文章心自得，五洲形势掌中收。
头衔何必劳人问，一笑功名付马牛。

以上这首对仗工整、气势磅礴的律诗，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想家、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王韬的著名诗作之一。该诗真实地反映了王韬一生不为功名、尽收“五洲形势”、著成“千古文章”的入生旅历，同时也体现了他“奔腾万里”、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上下求索的雄心壮志和博大情怀。

一、书香子弟　清高少年

王韬，原名利宾，后改名瀚、韬等，字紫诠，1828 年 11 月 10 日（清道光八年十月初四）生于江苏省新阳县甫里镇的一个私塾教师家庭。他的祖上，在明代时是大家巨族，曾有好几位任朝廷命官。但是，经明末农民起义和清军南下的兵火，家道开始中落。尽管如此，他的家族在当地依然是一个书香门第，世代以诗文相传。他的曾祖父，学问广博，为县廪膳生，授候选训导官，曾设馆授徒，多次辞谢官府的征辟，终生以教书、治学为事。祖父王科进，字敬斋，为太学生，曾参与乡政，行善举，授五品职衔，晚年被特别举为乡饮大员。父亲王昌桂，字肯堂，为县增广生员，工诗善文，学问渊博，尤精于儒家经典，因家贫，无法参加科举考试，为衣食计，开学塾于苏州城东门外的甫里村，以馆为家，传道授业，一生刻苦自励，著述颇丰。

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世家，王韬自小就深受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熏陶。特别是他的母亲朱氏，由于出身名门，饱读诗书，故而，对幼年的王韬就管教甚严。在王韬四、五岁时，母亲就为他口授“三字经”、“千家诗”和唐诗宋词，并给他讲述历代“忠贞节烈之事”，希望他长大后能像这些英勇反抗外族入侵、捍卫国家社稷、保持民族气节的英雄人物学习。幼年的王韬，遥望着深遂浩瀚的星空，听着母亲的讲述，每至惨烈恸人处，便失声痛哭。正是在母亲的严格教诲下，他那幼小的心灵中便已埋下朦胧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为民请命的愿望。

稍长，他便进入父亲开办的私塾中就读。在父亲的亲自执教下，他日夜苦读，寒暑不缀。加之生性颖敏，过目不忘，从而在八、九岁的时候，便遍读小说笔记，并能成段背诵古文。为了能让他走上科举入仕的道路，父亲在他 10 岁左右，就教他学做八股时文。不过，对于八股文那种承、转、起、合的死硬风格和无病呻吟的空发议论，少年时代的王韬就不感兴趣。他最感兴趣的，是在课余饭后，吟诗咏文，状物写意。

由于父亲要外出设馆，少年的王韬无法随父就读，故而，他便进入离家乡不远的长洲县青萝山馆，就学于当地的饱学之士顾惺。这位顾老先生是一位明经，曾著有《涤庵诗钞》等著作，不仅学问深遂，而且思想开明。他不仅教授学生四书、五经和八股时文，而且允许学生阅读儒家经典以外的各种书籍。在这里，王韬得以饱览中国历代的丰富典籍，如二十二史、《资治通鉴》及各种野史笔记，知识面有了很大的开拓。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王韬对作诗填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熟读并研究历代诗人的作品，欲以探其源流，究其旨趣。在馆内诸生中，他的诗文常以才情并茂而出类拔萃，并因此而博得顾老先生的赏识。

青萝山馆的生活，对王韬的一生影响很大。在这里，他精研文史，博考事理，为他日后的学术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他后来落拓不羁、锋芒毕露、才气横溢而又恃才傲物的情性，也与这段学生生涯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才情卓越　科场失意

1843 年，年仅 15 岁的王韬已经是一个熟读诗书、志向远大的青年。父亲对他的期望很高，希望他能出人头地，重振家业。师长也对他寄予厚望，推许他日后将成为不凡之才。王韬自己也踌躇满志，跃跃欲试。这年秋天，他赴新阳县城赶考，一举便中。县试主考官认为他的答卷，“ 文颇不凡 ”，并为之“ 击节叹赏 ”。经过这次考试，他被补为博士弟子员。消息传来，亲友、乡邻都来他家祝贺。一时间，王家大院，红灯高挂，鞭炮声声，贺客盈门。然而，对于这一切，王韬却不为所动，依旧持卷把读，旁若无人。当他的族兄称赞他为“ 吾家之千里驹 ”的时候，他大不以为然，并说：“ 区区的一名博士弟子，何足轻重？他日我当为天下画奇计，成世功，救万民；否则，宁愿以布衣之身终老乡野，作隐逸山林的一流高人！ ”可见，此时的王韬已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乡里的亲友遂把他与素有“ 甫里先生 ”之称的唐代名臣陆龟蒙相比，极赞其才。

17 岁那年，王韬去昆山应试。拿到试卷，略作思索，他便广征博引，文如泉涌。不到一个时辰，洋洋万言的答卷，便一气而就。江苏学政张芾在众多卷子中，发现他的答卷学识不凡，书法工整，文有奇气，便给他一个第三名。

由此，王韬便作为一名秀才，进入县学。然而，当他进入县学之后，他才知道，这里所教的一切，都是为应试科举考试而来。尽管父亲对他期望很大，希望他通过科举取得高官厚禄，以重振家业，但是，他却对科举考试产生了深深的疑问。他感到，科举考试不问一个人的真才实学，唯以僵硬死板的八股文取人，使得一班年轻人整天低首下吟，毫无生气，一旦中举做官，便又蝇营狗苟，置国计民生于不顾。故而，他一进县学，便轻视时文举业，而致力于诗文的锤炼。

由于家境的日益衰落，父亲的教书所得已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母亲朱氏从早到晚，辛勤纺织，以补家用，但依然捉襟见肘。王韬衣食无忧的读书生活终于划上了句号。1846 年，他的父亲应邀到上海设馆授徒，18 岁的王韬便只能代父任教，走上了设馆教书的道路。他来到了离家乡不远的锦溪办学，教授生童。

当时在锦溪私塾中就读的学童不多，事情也少，王韬得暇研习经史，作诗作文，过着田园般的平静生活。尽管他对科举入仕之道，十分鄙视，但是，为实现自己经纬天地的宏伟理想，他还无法放弃科举这块敲门砖。1846 年秋天，江苏省 3 年一度的乡试在南京举行，带着父母的期望和自己的抱负，王韬走进了考场。

然而，出乎王韬意料之外的是，这次考试，他竟名落孙山。经过这次科场的失意，王韬从此绝意科举。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他进一步看清了科举制度的腐朽。于是，他便由此前对科举考试的怀疑，进而发展到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猛烈批判。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科举考试所选拔出来的人，

大多是井蛙式的鼠目寸光之辈，他们或是迂腐苟且，或者奢靡无耻，因此自己决不“坠实废时”、“苟阿世俗”，一定要走一条有补于国、有益于民的人生道路。

三、上海之行　大开眼界

1848 年，立志做一番大事业、但因科场失败一时还没有找到人生出路的王韬，来到了上海。此时，鸦片战争已发生 8 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也已 6 年。随着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的设立，上海遂成为国内外贸易的中心，逐渐出现了畸形的繁荣。初来乍到的王韬，一方面对家乡日益凋敝的农村景象记忆犹新，另一方面又对上海出现的一些新学问、新技术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身经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积水深潭中的初步激荡，王韬开始了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深沉思考与探索。

鸦片战争后，对于“区区岛夷”的英国能打败堂堂天国的这一严峻事实，一些清醒之士，就已开始了认真的思索。先是林则徐“开眼看世界”于前，继有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倡导于后。他们认为，在国门洞开、强敌压境的新的形势下，过去那种天国至上、唯我独尊的传统观念已经不合时宜，应该睁开双眼看世界，向侵略中国、确有一技之长的英国等西方国家学习，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进而再以此来抵御外敌，富强国家。

未到上海之时，王韬虽然抱有远大的志向，但对如何实现自己的抱负，却是十分迷惘的。那时的他，像许多传统的士大夫一样，对入侵中国的英国为何物，也是不甚了了。带着中国传统士大夫所特有的“夷夏之大防”偏见，他认为华夷之辨是十分重要的。故而，当他得知自己的一位朋友因家境贫寒，被迫到上海的外国洋行去谋职时，十分激愤，并写了一份措辞十分激烈的长信，劝友人以名节自重，赶快辞职归来。

然而，到上海后的一些亲身经历，使王韬改变了自己原先的看法。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鸦片和宗教的输入，西方近代先进的科学和技术也传到了中国。特别是在上海，由于得风气之先，更是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和百工杂艺的会聚之地。这些为欧风美雨吹洒而至的西学，都是他以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奇之物。为了探究其中的奥秘，他主动去拜见外国人士，并参观当时西方传教士设在上海的“墨海书馆”以及“英华书院”等地。通过实际了解，王韬认识到，西方国家确实有许多东西值得中国人学习。正因为如此，1849 年 5 月，当主持“墨海书馆”的英国人麦思都邀请他加入书馆工作时，他便欣然同意，举家前来。

当时的墨海书馆，除出版一些宗教书籍外，还编辑、翻译和印刷西方科技文化方面的读物。王韬的工作，就是将传教士们所翻译的书籍中“拘文牵义”之处，加以“疏通”、润色和编辑。通过与传教士们的接触，王韬从他们那里“耳食”到许多西方的科技知识；而日复一日的编译工作，又使他得以了解不少天文、地理、历算、舆地等格致之学。几年下来，王韬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均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在墨海书馆的 10 多年间，王韬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翻译了大量的著作。其中，著名的有《格致西学提纲》、《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和《西国天学源流考》等。在这些著作中，主要以介绍西方近代的算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电学、声学、光学和医学为重。这些著作的翻译及其刊布，

为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

也就是在墨海书馆期间，王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当时，一方面是西方列强对华的入侵步步深入，另一方面，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地展开，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互相交织。面对这一局势，一向以匡时救国为己任的王韬，开始留意时政，并以自己的所学所识，指天划地，以期有补于时。当时，他的一位朋友在曾国藩的府上任幕僚，他便给这位朋友写信，陈述自己关于时局的主张，希图通过这位朋友，将自己的思想陈述给曾国藩，以期影响曾国藩的政治举措。信中，他详细地分析了西方列强入侵对中国传统经济的破坏作用，对日益凋敝的国计民生，表示出深深的担忧；对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认为是国家内部的事，好比家中不和，因此，他反对当时满清朝廷的所谓“借师助剿”之议。这封信反映了王韬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对西方殖民者保持高度警惕的思想。

1856 年，正当太平军与清王朝进行激烈的搏斗之际，英、法、俄、美 4 国为了进一步扩大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所取得的在华权益，便借口“亚罗号事件”，组成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 年，清政府在大沽、天津等地战事相继失利，与侵略者订立了《天津条约》。2 年后，侵军再次发动武装进攻，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自此，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清政府的无能、中国的积贫积弱，也就更加彻底地暴露在广大的中国人民面前。

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波涛汹涌的农民起义浪潮，唤醒了人们的普遍觉醒，王韬的内心世界也激起了阵阵浪花。他虽然依旧闭门读书、译书，但是，目睹时艰，使他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了挽救时局，他认为一定要镇压太平军起义，但是，他又认为更重要的是必须首先抵抗外国的侵略。他指出：“当今天下之大患，不在平贼而在御戎，何则？乱之所生，根于戎祸之烈也。”也就是说，西方列强的入侵，是导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祸根，也是中国社会动荡不宁的最主要根源。现实中的农民革命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不时宰割，使得王韬再也无法保持其清高不拘的学士式生活姿态，他决心立而言，行而动，有所作为了。

四、献策当道　指天划地

此时的王韬虽然只是一个没有一官半职的布衣书生，但是却时时以挽狂澜于既倒的“横塑英雄”自励，因此并不满足于空发议论，而是力图以自己的思想来影响当道，谋划时局。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男儿在世事业多，安肯低头弄故纸。生平学剑愧无成，弄此毛锥亦足耻。”故而，自 1858 年开始，他先后给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徐有壬等清朝大吏上书，集中就“弭盗”和“御戎”两大问题，献计献策。

王韬认为，当时的中国面临着“贼乱”与“戎祸”的两大危险。两者中，抵御外国侵略是根本。然而，两害相较取其轻，对于清廷来讲，太平天国的威胁更大、也更直接。为了在“贼乱”与“戎祸”之中，求得主动，他还就“弭盗”与“御戎”的具体策略，提出自己的意见。

所谓“弭盗”，就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出于地主阶级的立场，王韬认为，当前对清王朝威胁更大、更直接的就是太平军，因此应集中力量来“平贼”。在他给有关清朝当局所上的“献策”中，十分详细地开列了镇压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具体措施和方法。由于他久居上海，对太平军政治中心所在的南京等地，十分熟悉，故而，他所提出的策略往往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太平天国有关情况的分析也比较实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不少建议为徐有壬等所采纳，更博得了清王朝有关当局的赞扬。

所谓“御戎”，就是警惕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王韬认为，清王朝当前的急务，虽然是太平军，但对于西方列强，也决不能掉以轻心。他指出，西方的商人“狡计百出，防之不胜防”，常常偷漏课税，因此一定要加强沿江沿海口岸的关卡。针对当时西方列强在中国拐卖华人，掠为猪仔的罪恶行径，他也建议清朝当局，一定要予以关注。

然而，命运往往会捉弄人。正在王韬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献计献策的时候，太平军却南征北战，所向披靡。1861 年，太平军攻占杭州，李秀成率领的大军，即将进攻上海。在这期间，王韬与太平军保持了多次的接触。由于太平天国曾对西方国家表示出友好，称西洋传教士为“洋兄弟”，西方国家也曾在清王朝与太平军之间宣布过“中立”。故而，在太平军即将进攻上海之时，西方国家便派出使者与太平军会谈。王韬因长期在上海墨海书馆帮助西方传教士译书，故而得机会多次陪同传教士去太平军占领区域，与太平军将领谈判。稍后，在把母亲和妻子送回老家途中，他又与太平军有关将领结识，并深得器重。由于长期与太平军接触，使得他对太平天国的情况和有关政策比较了解。在与太平军的接触中，他还看到天国内文人很少，又听说天国将领“求贤若渴，待士如宾”，因此，认为这正是其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于是，托求太平军的“庇护”，以自己的见多识广以帮助太平军取得胜利的心理，便油然而生。经过精心筹划，1862 年 2 月 2 日，他化名“黄畹”，给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刘肇均写了一封“上太平天国书”的长信。在这封信中，他从统筹全局的战略高度，对太平军如何进攻上海的战略和策略，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就这样，前不久还在为清朝大吏指陈“平贼”之策的王韬，现在则变成了一位为太平天国事业指天划地的谋士。

王韬给太平天国上书的主要内容，是劝告天国将领应以攻占长江上游为上，而暂时缓攻上海所在的长江下游。由于这一建议与太平军原订的进攻上海之略策相悖，故未被采用。稍后，李秀成屡攻上海不下，清兵又围上游的天京，李秀成便只好调军回防天京。王韬的上书也留在上海近郊的江南军营之中。1862 年 4 月，清军攻下上海近郊的太平军营，发现了王韬的上书，见其中所陈，皆中要害，故而“闻之大惊”。就这样，王韬上书太平天国的事，终于暴露。

上书事件败露后，清政府当即下令缉拿王韬。为躲避清政府的追杀，在英国领事麦华陀的帮助下，王韬逃到上海的英国领事馆避难。

五、流亡香港　倡导西学

1862 年 10 月 5 日，王韬乘上“鲁纳”号从上海的黄浦江启碇出航，经东南沿海向位于祖国南方边陲的香港出发。从此，他结束了在上海达 13 年之久的“佣书”生活，开始了漫长的海外流亡生涯。

经过几天的航行后，10 月 11 日，王韬到达香港。根据事先的安排，他去找“英华书院”的院长理雅各。理雅各是英国著名的汉学家，伦敦会的传教士。他领导的“英华书院”除培养宗教人才外，还以培养外语人才为急务。

早在上海，王韬就经麦思都的介绍，认识了理雅各，相互间有一定的了解。此时，理雅各正计划将中国传统的四书和五经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计划，也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故而，当理雅各邀请王韬与之合作以完成这一计划时，他也就欣然应允。

此时的王韬，对于译书工作，可以说驾轻就熟。在上海“墨海书馆”10多年的工作，使他在这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加之他自小谙熟儒家经典，对四书和五经等中国传统典籍，颇有研究。故而，在与理雅各的合作过程中，经过他的修改、润饰，译文不仅文采华美，而且辞意通达，因此，更加受到理雅各的赏识。

流亡到香港之后，在译书之余，王韬还对自己今后的出路作了进一步的思考。作为一名被清政府通缉的“叛逆”，他的仕途已经断绝。身处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又使得他对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有着更加切实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飞跃，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对西学的认识上，由传统的保守观点而发展到对其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在这以前，尽管王韬对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但是，在对西学的总体认识上，却一直停留在比较传统和保守的阶段。他认为，魏源所说的“师夷长技”，应该主要是指西方的坚船和利炮，至于其它方面，则完全没有必要向西方学习。他说：西方“器械造作之精，格致推测之妙，非无裨于日用，而我中国决不能行”，甚至认为，西方的机器、铁路等新式工业等，都是“奇技淫巧，概为无用之物，何足轻重！”相应地，他则把学习西法仅限于火器、轮船和语言文字等十分狭窄的方面。

但是，移居香港后，通过对香港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亲身感受，使他在对西学的认识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对比，他已朦胧地看到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与积贫积弱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样，在他的内心世界里，西方国家的富强，与其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似乎也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不知不觉之中，他开始对中国的传统礼教、伦理道德与封建制度，产生了怀疑。他发现，西方不仅在“器”方面是先进的，西方的“道”似乎也比中国高明。“西来绝学当今稀，畴人法在谁人知”，“道以载器”，道随器行，因此，他认为，“大道久凌夷，卮言患日出，福音自西来”，明确地表示西方之“道”胜于中国之“道”。

其次，从整个世界的变局中，他认识到西方列强的入侵一方面固然“足为中国之害”，但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振兴富强创造了“出世之机”。王韬认为，“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海舶枯艘，羽集鳞萃，欧洲诸邦几于国有其人，商居其利，凡前之史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市”。在这种情况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也就是说，随着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西方列强“款关求市”，开展国际性的通商贸易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中国境内，列强云集，万商逐利，正是这一历史发展的结果。他认为，西方列强的入侵，固然是中国之大害；但是，另一方面，“夫天下之为吾害者，何不可为吾利？毒蛇猛蝎立能杀人，而医师以之去大风，攻剧疡。虞西人之为害，而遽作深闭固据之计，是见噎而废食也”。这就是说，在西方列强纷纷入侵的局势下，中国的应对之策，不是“深闭固据”，而应主动出击，迎接挑战，应该抓住机遇，善于向西方国家学习，以“西学”之长，来补“中学”之不足。因此，他认为，强敌压境的险恶局面，也同时为“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

之士”创造了一个极好机会。如果我们能与时并进，变害为利，就完全有可能改变中国积贫积弱之势，使得中国能在万国争雄的“古今未有之变局”中，赢得“出世之机”，使得中华民族能在世界的民族之林中横空出世、蒸蒸日上。

再次，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深厚的包容性、继承性和不间断性出发，他批判顽固派视西方近代文化为“奇技淫巧”的观点，认为学习西方文化是发展中国文化的必须。针对顽固派认为学习西方“将以夷变夏，不几率中国而西人乎”的论调，他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说明这完全是一种杞人忧天之论。他说：“我之所效西人者，但师其长技而已，于风俗人心，固无伤也。”也就是说，学习西方文化，主要是学习别人的长处，而不是要完全“西化”。如果无视西学的长处，而固守中国的传统，并因此而“因循自封”，则“中国三千年以来所守之典章法度，至此而几将播荡澌灭”。这样，不仅无法保存中国固有的文化，反而将使中国传统文化沦入万劫不复之地。

尽管这一时期王韬所倡导的“西学”，还基本上停留在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方面，远没有上升到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等层面，从而也没有提出按西方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来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但是，他所开列的这一“西学新方”，则是对林则徐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过程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他所倡导的西学新知，对于闭塞已久的中国人来讲，无疑是一股清新的思想激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股思想激流必将在峰回路转之中，曲折前进，并最终汇成气势磅礴、光彩夺目的万丈瀑布。

六、漫游泰西　思想成熟

1867 年，英华书院的院长理雅各回国省亲。由于一时无法回到香港，故而，他便邀请王韬到英国去与他合作翻译中国经典。王韬久存漫游世界之心，很想到当时领先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英伦三岛去作实地考察，了解其强盛的根源与现实。故而，在接到理雅各自英国发来的邀请后，他便欣然应允，并于 1867 年 12 月 15 日动身前往英国。

王韬此次游历西方，不仅是他个人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且也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在他之前，虽然有主张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和魏源等，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对西方的认识，还只是“隔着纱窗看晓雾”，得到了仅是朦胧、零碎的西学知识。王韬自己虽然也曾大张旗鼓地宣传过西学，但也仅限于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这一浅表层面。现在则不同了，这次，他毅然跨出了国门，实地考察欧洲，直接接受西学的熏陶，了解西学的底蕴，这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意义。

王韬此次的“泰西汗漫之游”，纵横十万里，历经十数国。一路上，舟经新加坡、槟榔屿、苏门答腊、马来亚、锡兰，入红海亚丁湾而至埃及的开罗，然后再从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到达意大利，再经法国马赛而抵达巴黎。每到一地，王韬都登岸考察当地的民风民俗，并把它们与中国进行一番对比。

王韬一路的考察，始终是从振兴中国的角度出发的。在新加坡，他发现当地华人极多，“不下十余万”，“虽居处已二百余年，而仍服我衣冠，守我正朔，岁时祭祀，仍用汉腊”。而埃及，曾经与中国一样，也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今除了只剩下金字塔等“古坟石棺”尚可“赢人”之外，其整

个文明早已衰落殒没。面对这一切，他百感交集，认为埃及“不知变通”终至亡国的惨痛教训，也正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来到巴黎之后，王韬更感到“眼界顿开，几若别一世宙”。当时的巴黎，可以说是整个欧洲文化的中心。作为一个来自东方的文化人，王韬对这里的一切，都觉得好奇而又新鲜。在这里，他还专程访问了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儒莲博士，并与他就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和汉文化的传播问题，交换了意见。

不久，王韬便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并到达位于苏格兰北部边境的理雅各家乡，参与理雅各的翻译事宜。两年后，他与理雅各合作翻译的《春秋左氏传》、《易经》和《礼经》等相继完成，并陆续出版问世。这些著作，对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曾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旅居英国期间，王韬除协助理雅各译书外，另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游览各地，参观各种新奇事物，广泛吸取各种文化科技新知，调查各地风俗民情，考察山川地理和西方各国历史，了解西方近代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眼界也随之大为开阔。

通过在英国两年多的亲身经历，王韬深深地体会到政治进步乃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也是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通过考察，他对英国的“君民共主”政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专门去英国的议院和国会实地参观，甚至还旁听英国下院的集会。他感到，在英国的国会和下议院，人们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参酌可否，剖析是非”，“国家有大事则集议于上下议院，必众论佥同，然后举行。如有军旅之政，则必遍询于国中，众欲战则战，众欲止则止，故兵非妄动，而众心成城也”，而这一切，在“朕即国家”的中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时的王韬虽然还没有提出改革中国政治的主张，但是，他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无疑已呼之欲出了。

在英国的两年，王韬不仅接受大量的西方新知识、新思想，而且还积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他与理雅各合作翻译的“中国经典”出版后，在英国引起不小的轰动，他也因此名噪一时，为英国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所注目。他曾应邀到英国最著名的学府牛津大学去讲学。在这里的讲坛上，他谈到，英国早在伊丽莎白时代起，即派人到中国广东等地进行贸易，以后英国人接踵来华，发生了令人不愉快的鸦片战争。为此，他呼吁英国当局停止对华的不平等行为，主张中英两国应该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稍后，在爱丁堡大学和苏格兰大学等众多讲坛上，他还从哲学的角度，就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长短优劣等，进行了比较分析。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期间，王韬还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前往英格兰海耳商会，抗议英国当局向中国输出鸦片一事。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对华的鸦片贸易也随之“合法化”。到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通过印度向中国输出的鸦片，已达到惊人的程度。王韬对此，极为痛心。在英国期间，他利用一切机会，向英国当局宣传鸦片对中国的危害，甚至直接与英国的一些资本家当面交锋。在英格兰海耳商会，他就曾针对一些英国人认为英国对华贸易“有益于外邦”的论调，提出强烈的抗议。他认为，在英国的对华贸易中，其他贸易事项如丝、茶等的确“有益”于中国，但是，就鸦片一项来看，除了英国能从中谋得暴利之外，对中国则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进而指出，英国人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仁义文明之邦，其一切行为都是出于“仁义之心”，难道以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也是“仁义之举”吗？这种为谋己之财而害人之命的贸易行为，难道与“文明仁义”之邦相配

吗？他的这一席发问，驳得英国当局的有关方面哑口无言，同时也充分地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鸦片输入的坚强决心和严正态度。

七、倡导改良　富国强兵

1870 年 2 月，王韬与理雅各一起，回到香港。如果说在这之前，“ 未经沧海 ” 的王韬还只不过是一个初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萌芽的“ 洋务秀才 ” 的话，那么，经过此次的泰西漫游之行，他已变成了一位忧国忧时、思想日渐成熟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了。

回到香港之后，王韬首先开展了对世界史地的研究。希图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历史的研究，探讨其强盛之由，以期为中国提供借鉴。经过多年的研究，他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共计撰写著作 100 多卷，主要有《法国志略》、《普法战纪》、《法兰西志》、《美利坚志》、《西事凡》等。在这些著作中，他本着 “ 略古而详今，舍远而志近 ” 的原则，对英、法、德、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研究。通过这些著作，他把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如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法国的共和制）以及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等，较为系统地介绍到了中国，从而为当时中国人认识世界、学习西洋、讲求西法，提供了全新的知识。正因为如此，这些著作问世后，无论是洋务派官僚，还是早期资产阶级维新人士，都十分重视，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曾国藩就称赞王韬为 “ 未易之才 ”，李鸿章则 “ 许以识议闳远 ”，丁日昌更是谓其 “ 能兼才、学、识三长 ”。稍后的维新人士如梁启超、唐才常等，也对他的这些著作，备加褒扬。这些著作传到日本、越南、朝鲜等国后，反响也十分热烈，尤其是对当时日本正在进行的明治维新，曾起有相当大的影响。

1874 年，王韬曾先后担任香港《华字日报》、《近事编录》等报刊的编辑和撰稿人，并一度出任过《华字日报》的主编。通过这些活动，他获得了大量的办报经验，同时也认识到了报纸这一近代先进传播媒介，在宣传新知、议论时局、阐发思想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故而，当 1871 年传教士欧海理停办英华书院时，王韬便决定买下该书院的印刷厂，并易名为 “ 中华印务总局 ”，排印具有维新思想和西学新知的著作。1874 年 1 月，在 “ 中华印务总局 ” 的基础上，他正式创办著名的《循环日报》，并以此为阵地，大规模地宣传其变法改良主张。

王韬的变法理论发展至此已趋成熟。故而，在主持《循环日报》期间，他便开始全面而又系统地提出其变法思想及其具体主张。

王韬的变法思想，师承并发展了清代早期启蒙思想家们用治乱来划分历史发展进程的变易史观。他用传统进化论的观点来观察中外历史的变化，肯定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趋向。他认为，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至秦始皇废封建而置郡县，三代至此而又一变。明代中期以后，西方大小诸国，叩关而求互市，皆聚于中国，因此秦汉至此又为一变。故而，他的结论是：“ 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 ” 正因为如此，“ 三代之法不能行于今日 ”，“ 盖于此时而不得不变古能通今者，势也 ”。这个 “ 势 ”，就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既然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在不断变化与发展之中，治天下之法也就应随时势的变化而不时变通。针对封建顽固派 “ 孔子之道不能变 ” 的迂腐之论，王韬认为，当今的局势，是 “ 孔子

之所未料及者也”，“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有可知也”。这样，他就把“孔子之道”移过来，并把孔子看作是变法自强的先驱，来为自己的变法自强主张寻找理论依据。

要变法，就面临着一个“如何变”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王韬认为，变有二种：“渐变”和“速变”，但他主张渐变，反对速变。在他看来，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虽变化不断，但是其变化均为平缓。他认为，社会在不变与速变之间，应该有一个渐变的过渡，否则在社会封闭、民智未开的情况下，大多数中国人必然难以承受速变，变法也就难成其功。他的《循环日报》之所以取“循环”二字为名，也是寓有从落后到进步、从不变到渐变这种“渐进循环”、不断进化的含义。

在一定要变、但又只能渐变的这一思想指导下，从 1874 年到 1884 年这十年间，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了《变法》、《变法自强》、《洋务》、《重民》、《尚简》和《治中》等数百篇政论文章，文字之多，倡导之急，在当时罕有其匹。在这一系列的政论文章中，他系统地提出了变法的主张，并对变法的纲领与基本格局，进行了多方面的反复论证。

王韬变法自强的纲领，是由“治中”和“驭外”二个方面构成的。“治中”在先，“驭外”在后，“治中”是本，“驭外”为末。他认为，“就今日而言，本末皆应变”。

所谓“治中”，就是在变法改良的基础上，治理中国的内政，刷新中国的政治。变革封建专制政体，仿效实行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进而建立新的资产阶级的国体，这是王韬变法自强理论的中心内容，也是其“治中”的基础和核心。他在对比了中西政治制度的得失之后，指出：“试观泰西各国，凡其浸浸日盛，财用充足，兵力雄强者，类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他同时还比较了西方各国的政体，“泰西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这三种政体，孰优孰劣？他认为：“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以长治久安；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必志难专一，穷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犹有中国三代以上遗意焉。”也就是说，三者相较，君民共主最为理想。针对洋务派认为英国船坚炮利、工商富足是其“立国之基”的言论，他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本末倒置之论，“英国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的君主立宪政体，这才是其立国之本。

要“治中”，就必须“重民”。王韬的重民思想已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所谓“君轻民贵”的思想范畴。一方面他接受了农民起义的教训，另一方面他还结合自己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权利观念的理解，因此提出了开言路、启民智、得民心，进而建立资产阶级君民共主的政治体制思想。

如何才叫重民呢？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如让民众自由择业，使工农商学“各操其业”，允许民间发展工商业，让民得利等。然而，在所有的重民举措中，最为根本的则是加强官民之间的联系与沟通，政府要倾听民间的要求，让人民讲话。尽管此时的王韬还没有明确地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让人民参政议政的机构，但是，他大量介绍西方的议院制、共和国制的目的，显然已寓有此意。王韬的这一思想，冲破了当时的洋务派只强调学习西方的科技，回避甚至有意抹杀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与其富国强兵之间存在本质联系的举措，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主张以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来改造和取代

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这一主张直接地影响了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后来提出的“满汉不分，君民同治”的主张，就直接来自王韬的这一政治思想，并最终把这一思想付诸于戊戌维新运动的政治实践之中。

从理论的高度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呼吁中国在思想和制度上实现根本性的变革，从而建立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强国，构成这一时期王韬思想的主旋律。为配合在政治上建立一个比较开明的、合乎资产阶级要求的君主立宪制政府的主张，王韬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政治改良的措施，如裁汰冗员，刷新吏制，如改革科举，兴办学校，如练就新军，加强海防，等等。

从总体上看，王韬的这些主张，体现了中国当时正在发展的资产阶级在外国强敌的欺凌下，要求改革政治并享有政治权利的呼声，也反映了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要求强中驭外、振兴中国的强烈愿望，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进步思想潮流。这个改革方案，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也充满西方资产阶级政治色彩的独特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是进步且富有战斗力的。

按照王韬“变法自强”的逻辑发展顺序，“富国强兵”之后，就应即时开展“驭外”活动，以争取国家的独立地位。他说：“夫治中即所以驭外，器精用足，兵练民固，而加之以星使，分驻各邦，消息相通，呼息相应，诸国咸有不遵王度者，共怀约章乎！”也就是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驭外”是以治中为基础的，只有国家富强，兵练民固，才能谈得上“驭外”，才能为国家的独立提供基础。

在具体的外交方略上，他提出了开展独立外交的思想。由于他长期在欧洲各国考察，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历史有较深的了解，故而他对当时的世界外交及所谓的国际公法的认识，远比一般的中国士大夫们高明。他清楚地看到，在资本主义列强世界中，小国对大国、弱国对强国，是毫无公理可讲的，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中，弱者永远只能为强者所欺凌、所掠夺。为此，他对满清朝廷依仗与外国签有一系列条约就自以为天下自此以后就可以相安无事的想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泰西立约不足恃”，“盖国强则公法我得而废之，亦得而兴之，国弱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用……处今之世，两言足以蔽之：一曰利，二曰强。诚能富国强兵，则泰西之交自无不固，而无虑其有意外之虞也，无惧其有非份之请也。一旦有事，不战以口舌，则斗以兵甲”。一句话，只有国家强盛，国际公法才能为我所用，也才有独立的外交可言。他的这一主张，不仅揭示了落后就会挨打的这一简单、但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对唤醒当时中国人对整个世界局势的认识，发愤自励，自强不息，从而为谋求国家的富强和独立，曾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针对当时中国尚属贫弱的现实状况，王韬认为，应该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开展外交活动，以弥补不足。他主张，首先应该派出公使，驻扎各国，“固修睦好，以利联络”。其次，应该在外国设立领事，办理海外华民与当地政府的交涉事宜，维护华人的权益。他指出，当时在海外谋生的许多华侨备受欺侮与虐待，由于政府没有领事之设，故而他们无可伸雪，如果设立领事，则控诉有门，“足以壮中国之声威，伸华民之愤抑”。

总之，王韬认为，今日言驭外，“法须通权达变，不拘一格，先求备览西事，熟谙洋务，熟稔国际知识与目标公法，深揆事务之缓急，而后方可言

驭外”。在观念上，还必须“清除畛域，相见以诚，讲信修睦，结欢交好”。然而，一切的一切，“根本则在乎自强而已”。弱国无外交，这就是结论。

王韬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在国外，在广泛考察所在国的国情，提倡中外友好，虽然他并无一官半职，但作为一名民间人士，还是做了许多“固修睦好”的工作，并时时注意维护国家的国威，受到所在国官民与中国派驻使节的尊重，他的外交才能也一直为一些驻外使节所重视。后来的驻日大使何如璋多次聘请王韬任驻日使馆官员，就是明证。

八、富国之道　在于工商

在王韬的“变法自强”思想中，致力于国家的富强是其中心环节。他认为，“富强即治之本”，“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也”。在“富”与“强”这两者之间，“富”又是基础，只有“富”，才谈得上“强”。因此，必须着眼于“求富”，“先富而后强”，“富则未有不强者”。由“富”而“强”，是他变法纲领中的两步曲。要“求富”，首先必须“兴利”，即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为此，王韬一改过去恪守传统的重农抑商和农本商末的观点，正式提出“借商力以佐国计”的思想。他猛烈地批判清政府的抑商政策，全面地阐述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重要性。他认为：“迂拘之士动谓朝廷宜闭言利之门，而不尚理财之说。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农为本富而商为末富。如行泰西之法，是舍本而务末也。……徒知其名而无其实，又复大言不惭，此真今日士子之通病也。如是天下何由而治？盖富强即治之本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故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者也。”

在批判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的同时，他又提出了“商为国本”的新本末观。王韬认为，经济改革的中心应该放在工商业上。他指出，“英之立国，以商为本”，其商人“远至数万里外，以贱征贵，以贵征贱，取利于异邦，而纳税于本国，国富兵强，率由乎此”。由此，他得出结论，“商富即国富”。这种“商富论”说明他已经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看作国计民生的根本，这也是对传统的把农业经济看作富国强兵基础的一种大胆否定。但是，他的这种“商富论”与西方近代的重商主义者一样，虽然看到了商品流通领域的重要性，但却把它视作唯一的利润来源，把外贸作为国家富裕的唯一途径，因而仅仅把握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外观，而没有看到其实质。不过，王韬此论，与西方的重商主义者又有所区别，因为他所说的“商”，不仅仅指商品流通，同时也包括了商品的制造和生产。当然，在他的思想中，流通是最主要的。这一特点也是时代特征的反映。在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民族资本刚刚形成的中国近代，主要要解决的是如何应对外国商品输入狂潮的问题，这一时代特征自然造成王韬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商品流通上。而且，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王韬的“以商为本”的思想，已不同于清初黄宗羲等人“工商皆本”的观点，也不同于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本末皆富”的那种带有封建残余的折衷主义观点，而是代表着全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向传统的封建观念的公开挑战。当然，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系统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但毕竟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较早的提出了“富商论”，其开创之功，实不可没。

在大力倡导“富商论”的同时，王韬还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工矿业和现

代交通运输业的设想。具体说来，有如下数端：

其一，是开采矿源，即开采煤、铁、五金诸矿。他认为，开矿是“利之先者”，而煤、铁、五金尤为重要。他说：“煤铁之利开，则不独机器船舶局中自饶于用，即以供诸国之用而无不足…… 矿务即兴，其利皆归于我。有铁以制造机器，可推之耕织两事。或以为足以病农工，不知事半功倍，地利之尽，西人工得广，富国之机权舆于此。”他还尖锐地批判清政府不断加派普通百姓赋税的做法，认为：“取之于民，不如取之于天地自然之利。所谓自然之利，山含其辉，地蕴厥宝，开凿五金诸矿是也。”。如果煤、铁、五金等矿得以开采，不仅可以增加国家的财税收入，而且还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真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利民。

其二，大力兴办纺织业。王韬把“用机器以织呢布”与“开矿穴以足煤铁”并称为“利之最巨者”。他发现英国对华贸易主要是纺织品，洋布洋纱大量输入，“于中国女红，无不有妨夺”。在洋布洋纱充斥中国城乡市场的情况下，要想与洋人争利，就只有以先进的纺织业来取代传统的手工纺织。因此，他主张彻底抛弃落后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制造业，代之以新式的大规模机器纺织业。他还主张，按中国各地所产，进行合理的地域分工，各尽所长，各兴其利。这样，我国自兴纺织之利，则“物贱而工省，且无需乎轮船之转运，其值必贬，西人又何能独专其利”？

其三，建立铁路、轮船等近代交通运输业，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他驳斥了那种认为使用铁路、轮船会造成大量失业的保守观点，“或曰机器行则夺百工之利，轮船行则夺舟人之利，轮车行则夺北方车人之利。不知此三者，皆需人为之料理，仍可择而用之。而开矿需人甚众，小民皆可藉以餬口”，也就是说，随着采矿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不仅不会夺民之利，而且还会增加就业机会，从而更加促进经济的发展。他认为，兴办现代的交通运输业，作用有二：一可“利国”，二可“利商”。这也正是他“先富而后强”、“商富即国富”指导思想的具体表现。

总之，中国必须大兴资本主义工商业之“利”，“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者，未之有也”。

为了尽快发展近代新式工业，王韬考虑到旧式的传统生产方式已不能适应新式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故而极有远见地提出了要采用西方雇佣劳动的形式，建立大规模的托拉斯企业组织，来经营和管理这些工矿企业和运输业。他说：“中国商贾之道，实鲜善法。莫如仿西国法，设立公司，流通有无，以近贩远，俾不至于有亏，而财源可以不竭。”他认为，只有公司这种形式，才能把分散于各地之财，聚为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为了保障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国家还应加以提携，要设立一个总的工商业管理机构以司其事，起到协调和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作用。为此，他建议政府设立“商务局”，“今日中国欲制西人而自强，亦莫如由商务始，欲商务之旺，莫如设立商务局始”。这是中国近代较早地提出设立商务局的呼求，实开甲午战后郑观应、陈炽等要求成立商部和戊戌变法中成立工商局的先声，比清政府 1903 年正式设立商局早了整整 10 年。

王韬还进一步指出，政府必须把各业之“利”，“皆公之于民”，这样才能促进人们的投资积极性，资本主义工商业才能在各个领域自由发展。因此，他坚决反对官办工商业，认为“官办不如商办”，“官办费用浩繁，工役众伙，顾避忌讳之虑多，势不能尽其所长”。为了达到尽快发展工商业的

目的，他还提出了一个方案：“ 令富民出其资，贫民殚其力，利益溥沾，贤愚共奋……夫能与民同其利者，民必与上同其害，与民共其乐者，民必与上共其忧。 ”这样，上下一心，劳资合力，就一定能够使中国的新式工商业得到长足的进步。

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就必须与西方列强“ 争利 ”，而要在“ 争利 ”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后盾。为此，他又提出“ 以兵力佐商力 ”来与外国竞争的观点，从而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和振兴国家联系到一体。他说：“ 吾观泰西列邦通商他国也，商之所至，兵亦至焉。无不驻战舰、设水师……一有龃龉，兵锋立启。 ”在资本帝国主义时代，军事征服与经济入侵总是同时开始的，军事征服是经济渗透的基础，同时也是经济入侵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正因为如此，他提出要借兵力卫商，藉商以强国。他说：“ 寓兵于商 ”、“ 以兵佐商 ”，“ 则商利日厚，而兵饷常盈，费省力倍 ”。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方无意外之虞 ”。他大声疾呼：“ 中国有志振兴，及今未晚也 ”，只要“ 商力 ”、“ 兵力 ”互为表理，使中国商人“ 行贩于重瀛者 ”，从而打开国际市场，“ 渐与西商争霸 ”，则国家富强一定指日可待。其富国强兵，力图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强国的心情，是何等的急迫！

九、著书立说　纵论中西

王韬以“ 待罪 ”之身，旅居香港 10 多年。在这期间，他满怀着爱国热诚，本着为国家富强和独立而献计献策的目的，在主持《循环日报》、大力鼓吹改良与变法的同时，还潜心著述，埋头于学术研究。集中地体现其这一时期主要研究成果的著作有《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和《瓮牖余谈》等。尽管这些著作体例不尽一致，论述的问题也各有侧重，有的纵论时政，有的评述史事，有的则近乎杂谈，但是，所有这些都在为谋求国家富强的思想主旨下，相互辉映，连成一体，反映了他这一时期思想的广博与深邃。

首先，这些著作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时代精神，这也是他这一时期全部著述活动的思想主线。翻开这些著作，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 变法 ”、“ 变法自强 ”、“ 治中 ”与“ 驭外 ”等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论题，使人感到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洋溢着时代气息和强烈的忧世爱国之情。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他还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正式提出了“ 振兴中国 ”的口号，这也正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倡导改良与变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

其次，在这些著作中，他再次阐述了东西文化并重和中外民族平等的思想。中国自古以来就有“ 夷夏之防 ”的说法，并一直以所谓“ 内华外夷 ”的原则，来处理国际之间的关系。对这种以地域来区别华夷的标准，王韬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他认为：“ 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 ”，“ 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 ”。他所讲的这个“ 礼 ”，在很大程度上，是指文明水准、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以此为准绳，西方的“ 夷 ”已大大地超过了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中国人，又怎可以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为此，他提出要打破“ 中国中心主义 ”的唯我独尊、自高自大的旧观念，主张中国应该走向世界，与他民族、异文化进行交流，以为互补。同时，他还看到，文明的中心是在运动的，过去落后的民族，现在可能已发展成先进的民族。因此，一个民族应该善于向他人学习，决不能夜郎自大，

不思进取。这一点与他此前一直强调的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再次，猛烈批判封建主义，提倡“男女并重”之说。他对中国妇女几千年来被压迫、被侮辱的命运，表示了深切的同情。结合西方之行后的亲身经历，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家庭中的最大特点，就是男女不平等和重男轻女、男尊女卑。故而，他在这一时期的有关著作中，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一夫多妻制生活，指出此种陋习，在西方早已绝迹，但在中国却长盛不衰，“自天子至于士，正嫡而外，无不有陪贰。爵位愈崇，妾媵愈众”。从西方近代的“天赋人权”理论出发，他认为应该“男女并重”，并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这一闪光的思想，是中国近代男女平等思想和妇女解放的发端，也是他社会改革思想的一个重要支点。

最后，在这些著作中，他还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西方近代的社会制度、政治生活、科学文化、学术流派、社会风俗、人种民族等，作了详细的记载，以开国人之视听，增进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在这以前，他对西方国家历史与文化的介绍，主要偏重于英国与法国。但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他却将介绍俄国、美国和日本的情况，作为重点。通过对美、俄、日三国具体情况的介绍，来评判其长短优劣。在这三个国家中，他对美国的民主共和政治，表现出由衷的赞叹。他认为，美国的民主共和政治，使吏制清明，国家富强，几乎已达到中国人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大同之境。相反，对于当时还处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的俄国，则予以抨击和批判。此外，对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他也花费了相当的笔墨加以介绍，他认为日本在经过明治维新、仿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之后，“近来国中政事风俗，大有变革，蒸蒸不丕，日臻上理”，而且“人才迭出”、“力讲富强”，“可谓盛矣”。可见，这时的王韬已不仅仅是空洞地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而是具体地提供了美、俄、日三种不同的实例以供中国变法之选择。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他已经能够从经济发展对社会历史的促进作用这一点上，来考察和认识不同政治制度的优劣利弊了。

十、东渡日本　他山采玉

1868 年，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推翻了统治日本长达数百年的封建幕府制度，建立了明治天皇政权。在“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总方针下，推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和外交活动，从而出现“百务并修，气象一新”的强盛局面，把封建落后的日本变成亚洲唯一强盛、独立的国家。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以及随后日本的日益强盛，对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向国外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近代爱国知识分子，是一个极大的刺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王韬就是最早向日本人学习的先进中国人之一。

在香港期间，王韬始终关注日本的发展。当他看到日本与美国“通商仅七、八年耳，而于枪炮、舟车、机器诸事，皆能精构制，精心揣合，不下西人”的情况时，感到十分震惊。特别对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政治、经济、军

事和社会面貌等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他更是感慨万千。他说：“前之所谓世外桃源可以避秦者，今秦人反而问津焉”，作为“巍巍上国”和“堂朝天国”的中国，却“反不如东瀛之一岛国”，难道还不值得中国人认真思索一下吗？

为了探讨日本取得成功的究竟，王韬很想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去实地考察一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的成功，自当会给中国人以启发、以激励。当时，日本的朝野上下，都正在锐意求新，他们“效慕西法，罔遗余力”，因此，对于中国人所写作的关于西方国家情况的著作，也很感兴趣。魏源的《海国图志》和王韬的《普法战纪》等书，也因此而成为日本知识分子了解世界大势的必读书籍之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知识界，正式邀请王韬访日。于是，1879 年 4 月，王韬终于如愿以尝，踏上了东渡的旅程。

由于王韬的许多著作在日本风行多年，并一直被视为“济世通时务”之作，故而，王韬在到达日本后，立即受到朝野各界的热烈欢迎。

王韬在日本期间，“遍交其贤士大夫”，除了与日本知识界作诗酬和、宴游唱答之外，他还与许多人士集中地讨论了学习西法的问题。针对当时中国和日本都有一些人盲目崇洋的倾向，王韬指出：“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则合之道矣。……故善为治者，不必尽与西法同。”他认为，学习西法，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加以适当的选择和变通，而不能以全盘抛弃本国的全部文化传统为前提。结合中国鸦片战争以后洋务派只知学习西方之坚船利炮，未识西方“致富强之根本”，以至二十年来中国国未富、兵未强的经验教训，他认为，学习西法，就是要学习西方富强致胜的根本，而不是样样皆学，甚至皮毛皆学。

在日本期间，王韬重点考察了明治维新及其给日本带来的巨大变化。本着这一目的，他详细考察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况，并广泛接触各界人士。通过实地考察，他感到日本的前车之辙，足为中国的日后之鉴，日本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人认真参考，中国欲谋富国强兵之道，除走日本的道路外，别无他途。

十一、眷怀家国　未尝敢忘

经过四个多月的日本之行后，这年 8 月，王韬结束了在日本的访问，经上海回到香港。扶桑归来的王韬，继续主编《循环日报》，过着办报著述的隐居生活。

王韬自日本返回的次年，发生了日本侵占琉球的重大事件。琉球原是中国的邻邦，先后为明朝和清朝的藩属。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随着国力的强大，即积极准备吞并琉球，进而窥视中国的台湾。1874 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为台湾士人所杀，悍然发动侵台战争。次年，日本又阻止琉球向清政府“入贡”，琉球国王便派人向清政府陈情。就在清朝驻日本公使何如璋就此事与日方交涉的时候，1879 年，日本正式占领了琉球，废除琉球的国王，把琉球改为日本的冲绳县。这年春，琉球国王派人向清政府请援，从而发生了日中交涉。身在香港的王韬，对此事深表关切。他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自认为能尽西人所长，急欲轻于一试。兹于船舰、枪炮，日事制造，陆军、水师，日事演练”，在这种情况下，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也就是必然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日中交涉过程中，“日人恃强横暴，非理横干，既不能以口

舌争，又岂能以笔墨战？”因此，办法只有一个：以牙还牙，“不如慑之以武功”，即以军事力量来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他在给清政府有关官员的信中，就曾明确地提出“军舰之制，水师之练，海防之整顿”的策略，并主张以此来作为中国与日本交涉的出发点。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边疆的多事之秋。中日因琉球问题的交涉未息，俄事又起，沙皇俄国正积极向东方扩张。长期研究西方各国、关注世界局势的王韬，此时已看到了这一问题。他分析了当时欧洲的整个形势，认为“近日欧洲形势又将一变”。在欧洲纷纭复杂的变动局势中，亚洲将再次成为欧洲列强宰割瓜分的对象。对于中国来讲，由于既“弱”又“肥”，而且与俄国邻近，因此一定会成为俄国窥视的对象。为此，他大声疾呼：“今日之患，孰有急于俄事者哉！”希图唤醒清朝当局，加强边防，以应不测。果然，1871 年，沙皇俄国借阿古柏在天山南北建立所谓“哲德沙尔汗国”之机，出兵侵占中国领土伊黎。清廷在慌忙之中，派特简公使崇厚经法国赴俄谈判。在沙俄的诱惑下，昏庸的崇厚竟擅自与对方签订了丧权失地的《里瓦吉亚条约》。消息传来，朝野上下一致谴责崇厚的卖国行径，清政府也拒绝承认该约，并责令崇厚早日返国。崇厚回国途中经过香港，王韬前往见崇厚，崇厚推病不见，令其文案陈养源接待王韬。王韬愤而责诘俄事，可陈氏却顾左右而言他，为崇厚开脱罪责，王韬大怒，愤然而归。

崇厚回国之后，被清廷治罪下狱。不久，清政府派出曾纪泽，与俄国进行交涉。不料谈判刚一开始，俄方的态度就十分蛮横，而且派兵开赴远东威胁。王韬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随即将情况通报给清政府有关官员，认为俄军此举，“意在经画东方，编立营制，慎严守备，为常行驻兵计，其志固不在小也”。为了防止沙俄狗急跳墙，他告诫清朝有关当局，应该吸取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那次深刻教训，一定要重兵防守，特别是“山东登州一带，当设重防，盛京三省之地，亦宜实之以兵力”。

为了制止俄军的侵略，王韬还结合自己多年来对国际局势的了解，提出了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牵制沙皇俄国的策略。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英、法、美等国都有着巨大的利益，特别是英国，为海上“通商之巨擘”，沙俄对中国的侵略，势必影响到他们在华的利益，因此中国应该联合他们，共同抗拒俄国。同时，俄国的南进，也会危及日本。因此，中日联合，也是良策之一。

作为“稔熟西学”的洋务人才，王韬此时的交游十分广泛，尤其是与清朝政府的大小官员，关系十分密切。上至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下至省、府、道、县有关官员，都与他有着来往。他把御侮自强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经常向他们介绍西方国家的情况，分析时事，并不时把自己的著述寄给他们，规劝他们留心时务，甚至要他们像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盐仓使团”那样，去欧洲各国亲自考察，开拓眼界，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势，从而加速他们变法改良思想的早日形成，由他们来实现自己的改革理想。他认为，这种自上而下的办法，是最有希望实现的办法，他也因此而孜孜以求，努力促成。

王韬蛰居香港，转眼已近 20 年。他那段上太平天国书的公案，也时过境迁，少有人知了。王韬作为举世公认的洋务人才、政论专家和著名的改良主义者，此时已名扬海内外。尽管如此，他却念念不忘故园，希望能尽早返回国内。要返回国内，则必须先经清政府取消通缉令，而这一点又必须依靠清

廷“有力者”相助。而此时的国内洋务大员，虽然对他有所倚重，但对他又抱有戒备之心，因此，王韬“归骨故里”的要求没有为他们所获准，他只能仍居于香港，苦苦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十二、定居沪上　热心教育

1884 年，经李鸿章的默许，清政府终于同意了王韬的请求，允许他回到国内定居。这样，王韬结束了长达 23 年的流亡生活，举家返回国内，并定居在上海。然此时的王韬，已经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了。

回到了阔别 20 多年的上海，王韬感慨万千，他吸取了以往“文字贾祸”的教训，更号为“淞北逸民”，并筑屋于淞江之北，以作终老之计。尽管如此，对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出路，他仍然时时索绕于心，而未敢须臾忘却。19 世纪 80 年代，西方列强加紧侵略中国，外侮更亟，而清廷却日趋腐朽。1884 年到 1885 年的中法战争，由于清政府的一昧妥协，使得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尤其是马江一役，清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福建水师，遭到致命打击，马尾船厂全部被法军摧毁。消息传来，王韬日夜难安，每每念及时事，他“往往愤懑郁勃，必尽倾吐而后快，甚至太息泣下”。在这种情形下，他再也无法安然地过着自己隐士般的生活。他决定不顾环境险恶，继续在上海宣传变法维新，并在《申报》和《万国公报》等报刊上，发表指陈时政、呼吁改革的文章。

1887 年，王韬正好 60 岁。这年，上海格致书院因华董徐寿去世而出现了危机。董事会经反复讨论，决定邀请一位博通中西的学者，主持其事。由于王韬多年来所享有的崇高声望，故而沪上的中西董事一致推举他任这一职位。王韬感到，格致书院不同于当时中国境内的其它旧式书院，它以介绍西学新知、培养新式人才为目的。这与他长期以来倡导的引进西学、致力于国家富强的思想相一致，于是便欣然接受了这一职务。

上海格致书院是中国近代第一所专门研习和传播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新型书院，也是中国最早的科学团体之雏形。1874 年 3 月由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提议，由中国近代科学家徐寿、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筹建，于 1876 年 6 月在上海正式落成。它不仅在本质上区别于其它旧式书院，而且与当时洋务学堂、教会学校等，也迥然不同。由于它是一个非官办的教育机构，经费自筹，教师由董事会中精通西洋学艺者担任，因而可以不授儒家经典，也可以不涉传教事宜，而主要立足于新学的引进和科技人才的培养。

王韬主持格致书院，“对于来学者颇望鼓舞振兴”。他也不负众望，主持期间，书院有了很大的起色。在他到任后不久，该书院“拟广招生童，前来肄业，延请中西教读，训以西国语言文字。学业有成，视其性质所近，授以格致机器、象纬、舆图、制造、建筑、电气、化学，务期有益于时，有用于世，国家预储人才，以备将来驱策”。这也正是他上任后的办学主旨。

本着这一办学宗旨，王韬主持格致书院后，主要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在书院内设立“学塾”，为童生授业。王韬认为，对于格致之士，必须从小培养。为此，他亲自为“学塾”规定教学内容，“自西国语言文字之外，教以格致诸端”，废除旧时文，而以新学为主要内容。王韬一生积极反对旧的教育方法和八股取士制度，主张废旧学，办新学，订制艺，储人才。现在掌管格致书院，无疑为推行他的理论和办学方针提供了实验基

地。因此，他把自己奋斗一生、但却未曾变成现实的变法图强的理想，寄托到这批士人身上。尽管这一计划后来因资金匮乏而无法实施，大规模招生因此被搁置，但是，在他的努力下，还是办起了较高程度的科学学习班和一些专科班，从中肄业的士人，少则数十人，多则百余人，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才。

王韬在书院中办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改革旧的教学方法，实行考课制度。原先的格致书院只是单纯地学习和研究西方的科学技术，因风气未开，前来受业者甚少。在教学方法上，也主要是以面授为主。王韬改变书院的这一办学宗旨，规定入院就读的士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更要讨论时事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因此，这一时期的书院，不仅是教授西方的语言和科技，而且还引导学生学习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学说。学生中留意时事，评论时政，一时蔚然成风。在方法上，王韬也努力作一番改进，提倡自由讨论和答问，并延请洋务官员出题对院内士人进行考课。自此以后，格致书院的性质与以前大为不同，从专重科技教育而变成既研究西方科技，又讨论时务的书院。

格致书院实行考课制度后，“远近名流硕彦，闻风兴起，彬彬称善”，一时间，入院就读士人，“多则百余人，少亦数十人，无不争自濯磨，共相奋勉”，以至于“功名士子贡举官绅均前来参与”，吸引了来自全国十多个省的知识分子。这些士人本来可以沿着科学之途做官入仕，但是，在当下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在西学东渐的濡染下，他们却慢慢离开了原来被视为无上荣光的仕宦道路，聚集在王韬主持的格致书院周围，为解决国家富强这一时代课题而孜孜以求，寻找着救国救民之路。

十三、老当益壮　初衷不改

在主持格致书院期间，王韬还进一步系统地宣传他的改良主义思想理论，写下了一系列匡正时弊的文章，并不时发表演讲，这些对当时的青年学生和整个知识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一时期，王韬的思想继续沿着时代发展的脉搏而前进。他根据自己主持格致书院多年的经验，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于国计民生一无所补。从科举制排斥西学输入，进而影响到国家富强的这一高度出发，他继续开展对科举制度的猛烈批判。他主张，以格致书院为基地，以格致西学为内容，大力开展政治、科技教育，杜空言而收实效，为国家造就有用人才。

王韬不仅在思想上为格致书院起了指导与引路的作用，而且在办学的方针上，也为书院作了具体的规定。为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他规定格致书院在讲习科学和实验演示时，大开院门，以备众听，并聘请学有专长的中外学者来院讲学。中国近代著名科学家华衡芳，就曾在该书院主讲了十余年。正是在王韬的这一办学宗旨指导下，格致书院与当时的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一起，成为清末上海“三个输入西洋学术的机关”。

格致书院的兴盛，使晚年的王韬感到莫大的快慰。多年苦心孤诣所倡导的富国强国之策，而今终于得以具体落实，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振奋。故而，在这一时期，他以一个年迈之身，频频四出活动，或为书院募集资金而东奔西走，或为延请学者名家而辗转忙碌。他的这些努力，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好评。王韬办教育的目的，根本还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富强发达。他把推广新学、教人育人与民族振兴、国家强盛联系起来，这种教育思想无疑是进步的。为着这一目标，他决心奋斗不息，并多次表示：“ 其为国家植人才，教育后世，夫岂有涯哉！ ”

在王韬的倡导下，格致书院成了吸引四方之士、传播西学、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基地。一大批新式的知识分子，沐浴着西学新知的雨露，迅速成长起来。他们考索哲理，交流思想，探究强国之路，抨击弊政陋俗，从而逐渐形成了一个既具有西学新知、又立志社会改革的新式知识分子群落。这批新式知识分子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并成为从改良主义者到资产阶级革命派之间过渡的桥梁。这也正是王韬和格致书院对中国近代社会所作出的最大贡献。

王韬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西方列强在中国掀起殖民瓜分狂潮之时。特别是后起的日本，自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一直跃跃欲试，把侵略矛头直指中国。中华民族日益深重的危机，并没有使清廷统治者清醒，他们依然文恬武嬉，不思变革，一切循旧。面对这一切，年近七旬的王韬，焦急万分。在主持格致书院、培养富国强兵人才的同时，他还在《申报》等报刊上，接连发表文章，呼吁御侮图存，变法救国。特别是对于日本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他更是大呼疾呼，要求有关当局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此时，他已看到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将侵略扩张作为其基本国策，并预见到日本即将成为朝鲜乃至中国的大患。为此，他“ 夙夜忧愤，肝疾剧发 ”，表现出一个爱国者在国家危亡之秋的悲愤和忧思。

1894 年，日本终于挑起了甲午战争。在战争中，清军连战皆溃，一败涂地。随即，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中国彻底地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以甲午中日战争为契机，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大觉醒。正如梁启超后来所说：“ 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 ”随之而来的亡国灭种之祸，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越来越多的爱国者，开始拍案而起。他们起而言，言而行，要求进行社会变革，以振兴中国。饱受战败刺激的王韬也认为，此时正是实行变法的大好机会，应该掌握这“ 一变之机 ”，力图振作，“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如果中国把握好这一时机，依然大有希望。这一时期，他在大量的文章和上书中，提出了比此前更为完整、也更为成熟的改革方案，涉及面很广，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科技以及社会风尚等，几乎无所不包。尽管此时他已经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了，但为了建设富强的中国，依然殚思极虑，初衷不改。

1897 年秋，“ 不作人间第二流，奔腾万里驾轻舟 ”的中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制的首倡者王韬，在他的上海寓所逝世，享年 70 岁。